

我的青葱岁月，我的“百宝箱”

李经

2025年，当我和昌增益回北京整整30年后的这个秋天，文化学社的老朋友王胜、何志工积极发起了文化学社及《北美行》的老友聚会，感叹时间荏苒之余，回望30年前的日子，如同去翻找一个放在角落里的百宝箱，很多宝贝上面蒙上了灰尘，以为再也不会打开，但一经擦拭却被唤起，光亮如新，闪烁着岁月的幽幽光芒。

此次为了30年后的重聚，何志工反复鼓动我写点回忆文章，我屡屡推脱，感觉自己在休斯顿的两年基本是“某人家属”，“没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”，不写也罢！但是，看了老朋友们的回忆文章，如同一双双温暖的手，帮我打开“百宝箱”，里面的宝贝一件件鲜活起来，焕发出神彩。

在美国的两年，真是一段以“诗和远方”为底色的日子啊。1994年1月，隆冬时节，我第一次坐上越洋飞机来到美国。落地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昌增益开着他的大破车去接我，休斯顿的机场很大，灯火通明。第二天，他带我去“南北和”，餐馆名字感觉很特别，让人足以读出这三个字散发出来的宽容与接纳。估计那里有他喜欢的“家乡味道”吧？只是不知道这家餐馆三十年后的今天是否还在？或许早已不在了，但是它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，算是我的“百宝箱”里的一枚胸针吧。

可以说在美国的两年，是美好而无忧无虑的两年，也是我与《北美行》结缘的两年。最开始，在昌增益的鼓动下，我写了《飞跃太平洋》（记得应该是这个题目），抒发了自己“只把美国当成打卡地”的想法，这个想法在当年是多么的“不主流”啊！这篇一蹴而就的文章激发了我内心深处蠢蠢欲动的“那支笔”，我先后又写了几篇，但是相比吴迪的高产，实在是差的太远。吴迪写文章如同她说话，一开篇便洋洋洒洒关不住闸门了。

继续说我与《北美行》吧！因为昌增益是这本杂志创始团队成员的缘故，我很快认识了骨干成员们，并在大家的怂恿下，担任了一期杂志的主编，一期杂志的副主编。这虽是一份因家属关系得来的荣耀，但我作为“文科生”还是蛮胜任的。文化学社和《北美行》如同一块磁铁，联系起散落在休斯顿的“留子们”，他们以大陆为主，兼顾港台，大家在艰苦的留学生活与生存奋斗之余抱团取暖、时常聚会，其乐融融。记得1994年的中秋，还举办了一场大型中秋联谊舞会，我和曾令同担任主持人，见证了大家的欢乐与友谊。

前面说，对我而言，在美国的两年是一段“诗和远方”的日子，30年后回头望去，那时的自己站在了历史的转折路口——当时的美国用包容之心接纳每一个外来之人；当时的中国，正在为腾飞蓄力；当时年轻的我，从没有现在国内年轻人这般的为生计发愁、为找工作奔波的焦虑。“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！”，我热切的拥抱它、感知它，懵懵懂懂、不计后果的挥霍它、享受它，我对自己的未来很少精细规划与算计，但时代给了我慷慨的馈赠。

《北美行》的日子，连同我出国前在国际广播电台的采编生涯，描画了我“主编”的底色。1995年12月回国以后，我在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任职，颇得领导赏识，被认为“文笔

洗练，很能写“（这位老领导是位清华女博士，只比我父亲小三四岁，后来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，现在还是我的忘年交）。回国后的 1997 年，我还和吴迪、曾令同等朋友共同写作、出版过一本名为《归去来兮》的书（若曾令同不提及，我险些忘记），我们采访了 20 多位归国留学生（当时还没有“海归”、“留子”之类的说法），集结成一本报告散文集，在出国潮没有褪去、“出的多、回的少”的当年，可以算是第一本“海归报告文学集”了，它虽然没有大热，却是我们对自己旅美生活的反思，是成长，也产生了共鸣。后来，有位北大研究生给我写邮件，问可否以这本书为数据蓝本，研究一下“归国留学生群体”，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，我欣然应允。

1997 年 11 月，昌凯文出生了，他与《归去来兮》同年“问世”，记得我在 1997 年六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出去采访一位海归，途经天安门附近，遇到庆祝香港回归的人潮……凯文出生后，同事送来一本图文并茂的大开本硬皮书，我得以从中学习如何给新生儿洗澡、喂奶等等，成为一名忙碌无助的新手妈妈。1999 年，我考取了清华大学传播学系的研究生，由于是宣传部的“委培生”，我开始了边带娃、边上班、边读研的日子，得益于“文科学霸”的老底子（当年高考比北大文科录取线高了 12 分，请让我小小得意一秒钟），第一年就修完几乎全部学分，专业课还拿到了全班第一的成绩。2003 年，我去新京报工作，任国际新闻责任编辑，算是坐实了“主编”的头衔，也拥有了“才女”的光环。这些的源头，皆来自《北美行》吧！

悠悠岁月，回首过往，甜酸苦辣涌上心头，然而我是如此心怀感恩，在我的“百宝箱”里，还能翻出很多宝贝，期待老友重逢的时刻，让我细细跟你们诉说……

2025 年 10 月 14 日 于北京